

中共温县党史资料

征编通讯



N
35
0

中共温县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

1

HE
285
98

《中共温县党史资料征编通讯》

(第一期)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版

创刊词	(1)
为革命树碑立传	马荣茂 (4)
马列主义在温县的早期传播	任怀泽 (6)
中共温县党史人物录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0)
关于范金堂与“血华学社”的回忆	赵砚斋 (12)
我所知道的范金堂与王	梁万忠 (14)
温县三义长农民暴动	任怀泽 任杨宇 (18)
温县三义长农民组织三次斗争	殷嘉璞 (22)
温县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	赵怀信 (24)
忆温县东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	翟茂林 (27)
忆在温县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	梁万忠 (3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简要经过及为什么 要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	(34)
中共温县县委关于建立“中共温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 纂委员会”的通知	(37)

创刊词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的热心关怀下，广大群众热切期望的《中共温县党史资料征编通讯》正式创刊了！该刊将再现温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封建压迫和剥削、抗击日寇侵略、埋葬蒋家王朝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温县的革命历史；使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为温县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动教材。

地处黄河北岸的古老温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母亲的宽阔胸怀和甘甜乳汁，温暖和养育了温县的炎黄子孙。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的勤劳人民，造就了诚实朴质、坚忍不拔的性格，历经沧桑，创建了辛勤耕织的家园。

在漫漫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苦难的温县人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得温饱，子子孙孙在痛苦中受煎熬。特别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更是在连年灾荒战乱中颠沛流离；在官府、地主恶霸的欺压下挣扎。他们也曾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拼死反抗，但都以血的代价终告失败。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一九二八年秋初温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立和开展活动，使温县人民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以后，杨磊党小组也在县西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党派人在温县创办了“抗日读书会”、“南贾战时师训所”和“抗日政教工作团”，又先后成立了番田和宋村学校党支部。从此，温县人民开始觉悟起来。到了一九四五年，温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由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在中共温陟县、温孟县和温县县委领导下，发展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建立了各级人民武装，团结和发动群众，同日、伪杂及国民党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温陟县、温孟县武装配合八路军老七团，全歼拒不缴械的日伪军，温县人民获得首次解放。接着，县委领导人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后，县委组织军民备战上山，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摧垮了残酷统治温县半年的国民党还乡团政权，终于迎来了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这个温县人民最后翻身解放的光辉日子，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继而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们为了温县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温县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所有这些，都应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作为子孙后代继承革命的精神财富，使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为此，我们将已经征集到的党史资料的一部分，以《中共温县党史资料征编通讯》的形式，分期编辑，不定期内部发行。主要刊登温县党史大事文献、人物（烈士）传记、专题研究、调查报告等重要资料。借此机会，谨向热情关怀和支持我们工作的革命老前辈和有关部门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力求资料真实准确。但由于我们知识浅薄、业务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并敬请在温县战斗过、工作过的老党员、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踊跃来稿，大力支持，使本刊日臻完好。

中共温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为革命树碑立传

——兼祝《征编通讯》创刊

中共温县县委书记 马恭茂

喜闻《中共温县党史资料征编通讯》创刊，不胜欣慰，这无疑是
一件大事。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温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几十年英
勇壮烈的斗争，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业绩，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人
物，把这些光辉的业绩载入我党的史册，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

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和严肃的政治任务，
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教育子孙后代继承革命的一件
大事。中央和各级党委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各级都建立了专门机构。
我县从一九八一年开始进行党史征编工作以来，已经收集编写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希望在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
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将这些宝贵资料编写成我县进行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党史征编工作又是一项党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尊重历史，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首先把资料立准立好，作
到材料可靠，判断准确，逻辑严密，把温县地方党史写成一部信史。

近来，我县已有一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虽年事已高，但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很强，希望广大老干部发挥“活资料”的宝贵作用，协助党史工作者回忆、鉴别、核实党史资料，为温县的修史工作做出有益贡献。也希望全县各机关部门、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热心关怀这一刊物，踊跃投稿，使之在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第六次工作会议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三日在郑州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主任赵文甫、副主任侯志英、宋玉玺、张增敬、冯登紫、霍云桥、蔡康志、张玉朋等和常委委员及各地、市委、省军区、省委党校、河大、郑大、社会科学院、省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出版社等单位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负责同志。

这次会议的中心是，传达胡耀邦同志关于史料工作的重要批示和中征委召开的华北七省、市党史工作座谈会精神，检查和布置我省的党史征编工作。省委〔1984〕86号文件转发了《会议纪要》。

我县党史办公室主任赵怀信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马列主义在温县的早期传播

任 怀 泽

掀开温县历史的扉页，现出一代风流人物叱咤风云的革命篇章，他们开一代风气之先，奔走呼号，启聋振聩，率先将民主革命思想传入我县，又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为在黑暗中生活的温县人民带来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为温县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一、新文化运动在温县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加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九二五年期间，是新文化运动在温县产生影响的高潮时期。

当时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的温县籍学生董希舜（晁召村人），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捕，经营救释放回乡后，在县立小学师生会上，他绘声绘色地详细介绍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伟大革命壮举，演讲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争取人权、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提出要在温县反对封建迷信、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妇女放足等。与会师生深受感染和启发。

当时在省立师范就学的郑师儒（字效古，郑门庄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也利用寒假和暑假，返乡向民众演讲反帝反封建的新

思想。有一次他曾在县府门前，站在方桌上慷慨陈词，指责时弊、痛斥土豪劣绅。他毕业回县立高等学堂任教期间，针对当时温县人民深受封建迷信的毒害，崇拜偶像、迷信鬼神、愚昧盲从的现状，联合李纪如（又名李则刚，番田人）、王香亭（又名王棻林，薛召人）等教师，提出了“打倒偶像，破除迷信”的口号。在老师的影响下，在校进步学生开始接触进化论等先进科学思想，自发行动，首先在县城打倒了城隍爷像，接着各村神庙的神像也多被学生打倒。为了向广大民众宣传新思想，郑师儒在校创办了《温声》小报。孙中山逝世后，他以苏武牧羊曲调，填入自编的“中山先生方弱冠，慷慨作先觉，壮志憾河岳，披肝胆历艰险，誓死建共和……”词，组织学生演出，启发教育群众。

董希舜、郑师儒等人的积极活动和宣传，首先使温县的知识青年从陈腐的封建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思想的潮流，在温县第一次向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等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激发了温县人民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愿望，为温县人民接受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二、马列主义在温县的传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温县的一些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外出寻找革命真理，在开封就学的较多。一九二五年，他们已经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中州评论》、《河南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近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协社”。在旅汴学生中，杜伊训（大吴人），于一九二六年经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来学昭介绍加入共产党，王济民（字师古，古城人）于一九二六年初应招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后加入共产党。此时，投奔冯玉祥西北军的范金堂也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成为温县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七年六月间，蒋介石与汪精卫、冯玉祥举行了以反共为主要内容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捕杀共产党人，范金堂、王济民和杜伊训先后回到故乡。他们三人保持经常接触，研究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积极揭露蒋、汪、冯新军阀“清党”的阴谋和背叛北伐革命的罪行。引导温县有识青年组织了“血华学社”，并创办了《血华周刊》，在温县开展马列主义宣传。

一九二七年秋，冯玉祥军在开封发现共产党员名单，通知温县将杜伊训逮捕，范金堂与王济民先后赴上海，在上海与刘锡五创办《流萤》杂志，后范金堂在参加江阴县暴动中牺牲。王济民于抗日战争初期回温县，先在“南贾战时师训所”任教官，后在“抗日政教工作团”任第一队队长。

这几个温县最早的共产党员，虽然没有亲身参加温县解放的革命斗争，但却首先将马列主义传入温县，是温县革命的先驱。

三、温县的早期共产党组织

温县东南部的冉继云庄(现朱家庄)有个冉思广，早在一九二七年在武陟省立第十四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武陟县委被迫转向秘密活动后，县委委员李子安、翟哲家(现名翟茂林)通过冉思广的关系，于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先后来到冉继云庄，分别在该庄和军地段家庄以教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县委秘书、联络员马龙图和党员宋宏升也常到学校来联系工作。

在学校里，首先发展年龄较大的学生冉继恒、徐泽善、王培贤三人入党；创立了温县的第一个党小组，冉继恒任组长。接着，由三个新党员分别回村串连发动贫苦青少年三、四十人，办起了“贫民夜校”。在夜校里，李子安、宋宏升通过教学生识字，如：“人人都有手和脚，人人都有肚和胸，为啥要有穷与富？咱们要……”分土地，一切平等，向学生讲解革命道理。后来，又在夜校发展思想进步的九名青年入党，组成第二个党小组，王九任组长。冉思广同其他先后入党的十二名党员，组建了温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冉思广任支部书记。此支部受武陟地下党领导，由李子安、宋宏升负责接头联系。

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形势紧急，李子安、宋宏升先后离开温县，冉思广也到郑州隐蔽（一九三一年返县）。至此，温县第一个党支部暂时与上级失去联系。一九三一年翟哲家任焦作市委书记后，再次到冉继云庄与冉思广联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冉思广在陈沟任教期间，又在陈沟、马村发展了数名党员，准备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区委。

一九三二年秋，省委机关被破坏，党领导的沁济暴动也遭失败，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人到冉继云庄搜捕共产党员，冉思广被捕入开封监狱，其他党员也四散隐蔽，从此，该支部中止活动。

一九三〇年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沁阳崇义镇人杨介人，在温县县西一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同一九二八年四月于开封入党的教师梁万忠一起，发展进步教师张保善及青年王汝宾二人入党，四人组成了党小组，在县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举办夜校，引导

进步师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和《一元论》等革命进步书刊。一九三三年秋末，因遭敌搜捕，分别到外地隐蔽，党小组活动由此中断。

虽然，温县早期党组织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摧垮，但这些党组织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温县人民的思想中扎了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燃起熊熊的燎原之势，引来温县解放斗争的大好形势，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根据赵砚斋、梁万忠、翟茂林、王少苍、杜伊训、王培贤等人回忆材料整理）

一九八四年九月

中共温县党史人物录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范金堂，字玉甫，温县留尚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青年时期先后在开封圣安德烈中学及安徽省第六中学读书。后从军于冯玉祥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后返县，创立并领导进步团体“血华学社”，从事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同年秋末赴上海，与刘锡五创办《流荧》杂志。一九二八年三月于江阴县被捕牺牲。

杨介人（1898—1936）：字廉泉，原名杨介臣。沁阳崇义村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办《廉泉》周刊，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二三年回国后，负责安阳、新乡、焦作等地的工运工作。一九二四年冬在安阳建立了党组织，任县委

书记。一九二五年参加了著名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八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押至开封，经营救出狱后返家到杨垒、木楼教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杨介人赴法前已与后杨垒张杏清结婚，由于岳母家无男儿，爱人常住娘家，故杨介人也常在杨垒居住，在温县西部地区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传播马列主义。他曾和共产党员梁万忠一起介绍进步教师张保善（后杨垒村人）及从江西苏区回来的王汝宾（王薛村人）入党，建立了杨垒党小组，并创办了杨垒农民夜校。一九三三年秋因形势所迫，杨介人离温到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后在天津被捕牺牲。

梁万忠：生于一九一〇年，温县南韩村人。一九二八年初考入河南省工人训练班，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开封领导工人运动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一九三〇年经营救释放后返乡，先后在杨垒、北平皋、南韩村教学。一九三三年夏，因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被国民党温县政府逮捕。同年出狱后同共产党员杨介人发展进步教师张保善和从江西苏区来的王汝宾入党，并创立了温县的早期党组织——杨垒党小组。一九三三年十月因形势所迫到外地隐蔽，解放后在兰州工作，现已退休。

翟茂林，原名翟哲家，武陟县北阳村人。一九二六年春在武陟省立第十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一月间任中共武陟县委组织委员。一九二八年春，同县委委员李克静、党员冉思广等在温县冉继云庄（现朱家庄）创建了温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三一年春奉上级指示重新组建焦作市委并任书记。一九三三年因遭敌通辑赴上海隐蔽，一九三七年返县组织“抗日救亡工作队”。（下转第21页）

关于范金堂与“血华学社”的回忆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于武汉)

赵 砚 斋

范金堂，字玉甫，温县留尚村人。我和玉甫在小学是同班同学。小学时代，玉甫是很聪慧的，在我们班上考试常常是第一名。上中学时，他在开封圣安德烈中学读书，和孟县刘锡五是同学。玉甫和他很交厚，以后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在圣安德烈中学读了两年书，又和张际青一道去安徽省（可能是第六中学）读了几年书。以后便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此时，玉甫大概已是共产党员了。一九二七秋，冯玉祥部队因清除异党，玉甫便脱离冯部回家。这时王济民也由武汉回县。二六年冬因奉军到开封，学校都停了课，旅汴温县学生也纷纷回县。玉甫就和他们在县城以县国民党党部的名义组织“血华学社”，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委员有张际青、玉甫等。“血华学社”出版《血华周刊》，内容多短小精悍，以破除迷信、提倡放足、推翻地方封建劣绅势力为宗旨，广泛向群众宣传，当时城隍庙神像和其它庙宇的神像被打毁不少。但这一活动引起了伪县长的密切注意，有一天傍晚，伪县长突然派人将另一名共产党员杜伊训逮捕，玉甫和王济民闻讯后，便先后逃往上海。这时玉甫的字已改为赤波。至此，县内的组织活动也因此停止。《血华周刊》出了几期，已记不清了。

玉甫到上海去，是因为他平时和刘锡五有联系。刘锡五当时是上

海江港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并且在上海党组织中非常活跃。半年之后，我从开封第一师范毕业，在江浙一带实习参观后，到上海考上了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开始在大学读书。由于同乡的关系，找到了玉甫和王济民。他们当时住在闸北天通巷的一个弄堂。我星期天常到他们那里去玩。有时他和王济民也到学校来看我。玉甫到上海后，勤奋学习，他常和我说，他的革命人生观更坚定了，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更正确了。为了宣传革命，他和刘锡五等人创办了《流荧》杂志，刊物名称的意思是流动革命宣传，玉甫任主编。这个杂志我读过，其中有一篇名为《山坡下的聚会》的文章，是玉甫亲手写的。内容是写革命的同志在山坡下开会，讨论革命行动。文章有两千字左右，写得很好。《流荧》至少办了两期。玉甫有次告诉我说，反动派非常痛恨《流荧》杂志的宣传活动，派了几个每月拿二、三百元的特务专门在上海捉拿《流荧》杂志的负责人，他住的天通巷是中国管辖区，很危险，要搬到法租界某街某号，他把地址告诉了我。这时他和王济民已分开居住。法租界离我读书的地方较远，我去看了他们两次。一次只找到了王济民，说玉甫很忙，不容易见到。第二次，我根据玉甫告诉我的地址去找他，问了楼上楼下的人都说不知道。以后半年大家未见面。有一个星期天，王济民忽然到学校找我，我只见他一个人来，便问玉甫怎么没来。他神态严肃，沉痛地说：“玉甫已做刀下鬼了。”我听后吓了一跳。他将详细情形告诉了我。原来玉甫和几个同志到江阴某地筹划革命活动（或暴动），被江阴警备司令部逮捕杀害了。逮捕的地点是在麦地里，大概事先他们得到了有危险的信号，分别疏散在麦田里，但结果还是被捕了。

玉甫牺牲之前常常说，搞革命必须走到革命群众中去。他实践了他的革命愿望，为革命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

玉甫不但革命意志非常坚强，而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除钻研革命理论外，书法和绘画都有一定造诣，同时富有领导和组织才能，因此到处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可惜不永其寿，甚使人痛悼和惋惜。

（史绍林整理）

我所知道的范金堂与王济民

梁 万 忠

范金堂是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从西北军回家的，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

我上的私塾原在沁阳城内，因被奉军占领，于二七年六月间迁到温县晁召村西头祠堂内。记得迁到不久，范金堂就来到这私塾里。他和在这里读书的杨益鸿、晁宝义两人，都曾在开封圣安德烈学校一块读过书。金堂极标致，谈吐也很文雅和蔼。他们初谈了别后的事情，接着他对这两位同学在这里读书表示惋惜。

杨益鸿跟玉甫来往的情况我不知道。只记得我随同晁宝义同学去过玉甫家多次。他俩除在开封同学外，还同在安徽第六中学读过书。他们谈了文学家钱杏村在六中教书的情况，又赞美六中所在地的芜湖赭山景色。第一次我就在玉甫家拿走十来本书，其中有文艺书籍，有郭沫若、蒋光慈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宣传品。从这以后玉甫还主动给我们送来一些政治方面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就在那

时，我才看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创造月刊》。而我还钻在私塾里读着《左传》、诗、赋等一些古文，很少看到过白话文。一气读了这几十本新时代的书刊，心胸为之一阔，耳目也觉得一新。尤其是玉甫对时局的分析，对青年应走什么样的路的阐述，给我的教育更为深刻，我恨不得立即投身到革命的烈火之中。

由于我们多次和玉甫来往，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对火热的斗争生活十分向往。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和宝义在玉甫的支持下，就瞒着家长，偷偷离开私塾，到开封找出路。

在开封，我们耳闻目睹了大革命时代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景，认识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还埋在古纸堆中，实在是太可怜、太落后了，早该钻出来，飞到光明的地方，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到开封后，我们遇到孟县的刘锡五同志，他和宝义同时在圣安德烈学校读过书。这时他名义上是“劳动大学”的学生，其实我们已知道他在开封作青年工作。我们要求由他介绍去上黄埔军校，他私下告诉我们：冯玉祥已背叛革命，派人捕捉南下的青年学生。以后，刘锡五同志给我们介绍驻在淮阳的高桂滋部的教导团，由于其它原因，我们没有去。

杨秉恒的兄弟杨守初，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思想极顽固。我们在开封不巧遇见了他。他说：冯玉祥也是赤化，出来的青年凡参加进去的都要白送命。严厉催责我们即速返温，去私塾好好念书。宝义对他有些畏惧，说实在的，我对他的话决不愿听，宝义却苦拉着要回来。当时我们住在旅馆里，手中的钱也已经花完，我只有十七岁，又无别的门路。无奈，只得返家，重又回到私塾里读书了。这次去开